

柳叶刀下扭乾坤 肝胆之上书春秋

追忆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

这是一双怎样的手啊？手指修长，灵巧有力的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曲，那是常年握止血钳和手术刀的结果。就是这双手，常年在肝脏的方寸之地破译生命密码，把近2万名病人拉出生命的绝境；同样是这双手，一边推开前行路上的荆棘，一边拉扯奋力攀爬的后辈，在一片荒地上筑起了中国肝胆外科的高楼大厦。这双手，属于吴孟超。

噩耗于昨日传来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、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在上海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低头，翻开课本，他是写在外科学第一页第一行第一个的名字，是传奇的“不老柳叶刀”；抬眼，仰望星空，有一颗编号为17606的小行星，名为“吴孟超星”，一如吴老的初心，明亮永恒。

“把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”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国内肝癌防治领域一片空白。当时，一支外国医学代表团应邀到长海医院访问。看到当时中国的医疗状况，其中一位日本专家断言：“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的水平，起码也要二三十年。”这番话让青年吴孟超彻夜难眠，他连夜赶写了一份报告给院领导，表明自己一定要给中国人争口气。

肝癌被称为“癌中之王”，致死率极高。而当时，世界上每年新发肝癌患者中，中国人占到一半左右。吴孟超决心“要把中国这顶‘肝癌大国’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”。

在世界第一例肝脏手术过去70年后的1958年，吴孟超和张晓华、胡宏楷组成“三人小组”，吹响了主攻肝胆外科的冲锋号。没有标本，“三人小组”从乒乓球材料“赛璐珞”上找到灵感，历时数月，在没有任何外界专业参照的情况下，自主成功制作出我国第一具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铸型标本。

乘势而上，吴孟超迅速转入对肝脏解剖结构的深入研究。对照文献，他细细研究整个肝脏内部血管的走向与交错，创造性地提出肝脏“五叶四段”解剖学理论，彻底颠覆了当时国际上对肝脏结构的简单划分。从此，中国医生掌握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。1963年，他又发明了“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”，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，使肝脏手术成功率一下提高到90%以上。



二〇一八年四月，吴孟超在手术中

图5

吴孟超的一生，做了一万六千多例肝脏手术，成功率达到98.5%。他的一系列成就，使我国肝胆外科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。吴孟超深知，光靠手术治疗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问题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就带领学生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战场，向肝癌的主动预防、早期发现和综合治疗进军。他带领的团队先后在肝癌信号转导、免疫治疗、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，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。

“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，而是救治生命。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，把一个个病人驮过河”

63x48.5x40厘米，18公斤！谁会相信，这组数据竟然属于一个肝脏肿瘤。这个巨大的肝脏肿瘤标本，陈列于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医院院史馆中。观者无不好奇，这颗被称为“世界之最”的硕大“毒果”，是如何从人体内剥离的？

故事发生在1975年。一天早上刚上班，一名男子撞开了诊室的门，张口就说要找“神医”吴孟超。病人叫陆本海，肚子好似十月怀胎，站立时都看不见自己的脚尖。吴孟超经过仔细检查，诊断其患了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。

这么大的肿瘤里充满了血液，手术中一旦出现破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会诊时，专家的意见很一致，做这个手术风险太大，不能做！但要是

一个医生见到疑难病症就选择“后退”，那么有很多病人将丧失活下去的机会。征求患者意愿后，吴孟超下定决心：做！那是一次与“死神”的过招，吴孟超赢了！经过12个小时手术，吴孟超大汗淋漓地为陆本海切下一个重达18公斤的瘤子。这是当时世界上切除的最大肝血管瘤，手术方案后来被肝胆外科界奉为经典。

从医七十余年，吴孟超的那双手创造了无数奇迹。

2004年，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的湖北女孩王甜甜痛苦万分——她的中肝叶上长了一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。经过多次会诊，不少专家建议进行肝移植。吴孟超却提出，肿瘤是良性的，只是手术难度大而已。慎重思考后，他决定不做肝移植，手术切除这个肿瘤。

又是一场鏖战。吴孟超创造的肝门阻断切肝法，前所未有的在一个手术中实施了4次。整整10个小时，时年82岁的吴孟超一直站着，没吃一口饭，没喝一口水，没上一次厕所。5年后，王甜甜把自己的婚礼选在了吴孟超赋予她新生的这一天——9月24日。王甜甜说，这是她的“重生之日”。

“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，而手术室就是我一辈子的战场，我要一直战斗下去”

三年前，27岁的安徽患者龚志龙来到医院。吴孟超为其检查后发

现，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并不是最难的，难的是肿瘤靠近心脏动脉血管，手术中极易引发大出血。有人劝他：“您这么大年纪了，就不要做这么复杂的手术了，万一出事，不怕一辈子的名誉受影响吗？”可吴孟超却义正词严：“我的名誉算什么，有什么比病人的生命还重要？这是两个孩子的爸爸，一个家庭的支柱，必须救！”在他的“生命之手”下，龚志龙很快康复出院。

在吴孟超看来，“一个好医生，眼里看的是病，心里装的是人。”吴孟超的床头有两个闹钟，他担心一个闹钟叫不醒，总是设置“双保险”，“不能让病人等医生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冬天查房，吴孟超会先把听诊器焐热；做完检查，他会帮病人把衣服拉好、把腰带系好、把鞋子放好；每个大年初一，他会握住每位住院病人的手道一声：“新年好！”

前两年，吴老身体已经不太好了，一直住在医院里，但依然常常有患者找上门来，拿着片子请教吴老。只要身体允许，他总是耐心给出建议。在他的从医生涯中，极少拒绝病人的请求。

在全世界，肿瘤手术的费用都非常高，很多病人因为费用问题看不起病。为了让更多病人看得起病，吴孟超千方百计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：能用普通消炎药，决不给患者用高档抗生素；能用手缝合创口，决不让患者花几千元用吻合器；能用患者随身带来的片子诊断清楚，决不做二次检查……

“这世上不缺乏专家，不缺乏权威，缺乏的是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”

披肝沥胆了一辈子，吴孟超感慨：“回顾我的一生，我常常问自己，如果不是选择了跟党走，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，我可能会有技术、有金钱、有地位，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，共产党员的分量有多重，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。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党、热爱党，发自肺腑地感激军队、热爱军队！”

这也是为什么吴孟超从来都是一身军装，不见穿便装。学生说，这让老师年轻，可吴孟超想的是，最后一刻能以军人的仪态倒下。

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，他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临床一线；抗击“非典”，他坐镇发热门诊，忘我工作；汶川特大地震，他通过网络视频会诊为前线服务，并向灾区捐献了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……

这些年，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（东方肝胆医院）的接诊量越来越大，床位越来越多，可是排队入院的肝癌病人队伍更长。老人急了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，他联合了6位知名院士，向国务院提交了“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、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”的建议案，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。国家和军队给的600万元奖励，他分文未留，全用来成立了研究基金，推动攻克肝癌的基础研究工作。

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准备工作。1978年，他第一个招考肝胆外科的研究生，不畏风险，担保自己的军医学生出国深造，再以一己魅力感召他们学成归国。如今，他给中国留下的是令世界都羡慕的肝胆外科人才梯队——一生培养出260多名硕士、博士和博士后，绝大多数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，撑起中国肝胆外科的半壁江山。

“一颗心，许党报国，一双手，济世苍生。”2019年1月，吴老主动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，光荣退休了，卸任了东方肝胆医院院长一职。他的学生和同仁一直记得吴老那段饱含深情的话：“我已经90多岁了，还能做多久？不知道。因此，我们要赶紧建立平台，借助平台快培养人才，快出人才。有了人才，有了平台，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就能开展下去，20年、30年、40年总能解决问题吧？到那时候，我在天上看……”

首席记者 左妍 记者 邵阳

东方卫视今晚重播

《我是医生》：一个医者大爱传承的故事

“2017年上影集团拍摄了吴孟超先生的传记片《我是医生》。其间，耳濡目染了吴孟超先生的高尚人格。拍摄结束时，他写下：‘我是一个医生’。我们把它作为片名。因为他说这是他生命的所有含义。”从不发朋友圈的上影集团原董事长任仲伦，在今天凌晨2时47分发了一条长长的朋友圈。作为电影《我是医生》的出品人，他动情地写道：“阅读着民众集体性对袁隆平先生和吴孟超先生的哀思与敬意，如风起，如云

涌。民心所向，感人至深。全民悲恸：你们为人民鞠躬尽瘁，人民将你们高举为旗帜。”

“今晚22:30，东方卫视就要再映这部电影，我也会重新看一遍。”《我是医生》的导演谢鸣晓接起电话，语气激动，“电影筹备、拍摄、剪辑、放映的一幕幕，都仿佛还在眼前。还记得，那个时候，好多次好多次，我跟吴老一块儿换衣服，一块儿洗澡，一块儿进手术间。”谢鸣晓说，这部投资并不算大、拍摄周期也不

长的传记电影，能够入选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评选，首先是因为吴孟超院士的事迹感人。《“我是医生”》的片名，是所有问题的答案。为什么要行医？为什么行医数十载要自己主刀一万多台手术？为什么要建立肝胆外科？为什么要致力于细胞免疫治疗的研究？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大女儿动手术……只因为，“我是医生。”于是，电影剧终时的字幕，他们选择用最冷静克制的语言，勾勒出吴老的生平：

“1922年出生……1956年参军、入党，选定肝胆外科为发展方向……1974年建立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……2006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……2016年主刀逾15000台。”数字背后的力量，震撼人心。

谢鸣晓说他特别感谢编剧：“虽然上影跟拍过吴老很多纪录片，但开机前，我们还是花了一年多时间走访、采访，梳理剧本结构。甚至，在开机前最后一刻，还在就影片结尾进行补充采访。从剧本到影片，吴老

都是满意的。”剧本经过了充分讨论，拍摄时候又得到了部队的大力支持，也为影片增色。“作为一部医疗片，《我是医生》没有哭哭啼啼，也不聚焦医患矛盾，而是专注地讲了‘我是一个医生’的故事，也讲了这份医者大爱的传承。”谢鸣晓说。

2017年6月，第一堂“电影党课”在上海影城开讲，94岁的吴孟超院士在《我是医生》放映前，特地为1000多名党员观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示范课。任仲伦回忆说：“吴老那天做了精心的准备，台上他精神奕奕，台下的观众，包括秦怡老师都听得很感动。”首席记者 孙佳音